

王造时 著

中国问题的分析 荒谬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造时 著 章清 编

中国问题的分析
荒谬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问题的分析 荒谬集/王造时著;章清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8
(复旦百年经典文库)

ISBN 978-7-309-11365-5

I. 中… II. ①王…②章… III. ①社会问题-研究-中国-民国②国民政府-史料-文集
IV. ①D669②K258.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614 号

中国问题的分析 荒谬集
王造时 著 章 清 编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5 字数 296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65-5/D·736
定价:5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 例

一、“复旦百年经典文库”旨在收录复旦大学建校以来长期任教于此、在其各自专业领域有精深学问并蜚声学界的学人所撰著的经典学术著作,以彰显作为百年名校的复旦精神,以及复旦人在一个多世纪岁月长河中的学术追求。入选的著作以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为主,并酌情选录论文名篇。

二、所收著作和论文,均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整理编订并撰写导读,另附著者小传及学术年表等,系统介绍著者的学术成就及该著作的成书背景、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

三、所收著作,均选取版本优良的足本、精本为底本,并尽可能参考著者手稿及校订本,正其讹误。

四、所收著作,一般采取简体横排;凡较多牵涉古典文献征引及考证者,则采用繁体横排。

五、考虑到文库收录著述的时间跨度较大,对于著者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用语风格、文字习惯、注释体例及写作时的通用说法,一般予以保留,不强求统一。对于确系作者笔误及原书排印讹误之处,则予以径改。对于异体字、古体字等,一般改为通行的正体字。原作中缺少标点或仅有旧式标点者,统一补改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六、各书卷首,酌选著者照片、手迹,以更好展现前辈学人的风采。

总 目

中国问题的分析	1
荒谬集	129
附录	259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王造时	章清 261
王造时小传	章清 273
王造时学术行年简表	章清 275

目 录

序文	4
第一章 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	7
第二章 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	21
第三章 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	41
第四章 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	54
第五章 中西接触与中国问题的发生	62
第六章 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	72
第七章 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上)	86
第八章 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下)	99
第九章 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	109
第十章 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	121

中国问题的分析

目 录

序文	4
第一章 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	7
第二章 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	21
第三章 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	41
第四章 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	54
第五章 中西接触与中国问题的发生	62
第六章 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	72
第七章 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上)	86
第八章 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下)	99
第九章 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	109
第十章 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	121

序 文

中国自古为文化之邦,那是一个事实,用不着我们去吹嘘。同时我们这种文明,经过两千多年根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也是一个事实,用不着我们去辩护。朝代的名字尽管换着:唐也好,宋也好,元明也无不好。做皇帝的人物尽管变着:太祖也好,太宗也好,高祖高宗也无不好。政治戏台上虽然三个打进,四个打出,忽而花脸,忽而小丑,忽而须生,忽而旦角,但是我们中国社会的根本,经过两千多年总没有多大变动。不错,我们虽曾被外族征服过好几次,但外族终被我们的文化所融化。我们中国虽经历无数治、乱、盛、衰的循环,但我们的基础条件,从没有遭过颠灭。一百年前的农民生活和两千年前的农民生活,并没有根本的差别。纪元后一千九百年的手工业制度,和纪元前九十年的手工业制度,也不见得有什么重大的变异。我们中国以前的社会,的确像一池死水一样,天天总是在平静的状态里面。纵或有时因为狂风暴雨,或被吹皱池面,或被打成水涡,但是深厚的池水,大体上并不受什么波动,并且风过雨止,全池仍然是平静如初。

在这样平静的状态底下,我们中国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社会价值,我们的风俗习惯,都凝成了坚固的模型。我们自己以为到了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境界,再不必有所改变。我想,若是我们的门永远能够像以前那样关着,若是环境能允许我们那样停滞不变的安稳过下去,我以为若干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与若干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情形大约不会根本两样。

不料中国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局势忽然大变。西洋来的枪炮,不但打破了我们的门户;西洋来的商品,不但赚了我们的金银;他们还带来全个西洋文化,向我们灌注。若是中西两个文化的接触,来得比较和缓,那么我们中国尚可逐渐适应新的环境,保持一种相当的平衡状态,而不至于崩溃得不可收拾。然而西方列强的野心,老实不客气,恃其超越的军力以临我们,绝不使我们有自由选择,循序适应的余地。西方文明如排山倒海的冲来,我们固有的全个文明如逢洪水一般,

只有崩溃下去。全个社会于是失却了基础。固有的思想、制度、文物，皆被倾出固有的地位以外，而发生绝大的纷乱。

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大纷乱，根本上是由于中西的接触。换一句话说，中国之所以成问题，中国之所以有问题，中国问题之所在，就在这一点。我们若是要去解决中国问题，那么非根本捉住这点不可。

根据中西接触为出发点，我去分析中国问题，我看在中国与西洋没有接触以前中国的社会是静的社会，各种组成中国社会的思想、制度及势力，都是几千年传统下来的东西，在社会上各有各的地位，成为一种系统，得着平衡的状态。因此，全个社会，都在静的状况底下安宁过活。我们这种静的社会，本来是自供自给，不愿与人家往来。但是我们不开门，西洋列强偏要打进来，与我们发生关系。两相接触之下，若是中国文明较优于西洋文明，那么我们的社会不但不会根本动摇，并且我们的文明有向外传播的希望。在历史上，我们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和其他民族发生过接触。现在回人、蒙古人以及满人的祖先，都与我们中国人有过许多交涉，结果他们终被我们所同化。

退一步，再假定中国文明与西洋文明能够互相颉颃，那么两者接触之下，彼此都有切磋的地方，同时彼此都有不拔的基础。这方面的文明又何能根本推翻他方的文明？在此种假定的条件之下，我们中国社会虽多多少少要受西洋文明的影响，但是还可保持相当的平衡状态，不至闹得天翻地覆，造成一个极大混乱。

然而，不幸，我们的文明在此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现代生活里面，的确不如西洋文明那样的健康。我们在玄学的或文学的眼光看来，或者不愿说这种没有志气的话，或者甚至可以跟着泰戈尔诗人大骂西洋文明的卑陋不堪，赞美我们东方文明的高妙。但是在现代情形之下，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文明实在敌不过西洋文明。所以两者相碰，我们不能不归于失败。我们起初与西洋人接触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他们与匈奴突厥同类，看他们不起，要他们的使臣磕头，说他们的使臣是来朝贡的。谁知他们一次一次的把我们挫败，我们才知道他们的利害。起初我们还只接受他们的物质文明，到后来连他们的精神文明，亦无法拒绝。这种西洋文明的怒潮，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如狂风骇浪的打来，把我们全个中国社会的基础摇动。我们固有的思想、制度及势力，渐渐被摇出原有的位置，由静的状态，而趋于动的状态。全个社会于是完全失却了向日的平衡。因为这种关系，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至第四章内把没有与西洋接触以前静的中国社会各方面加以分析。第五章是讲转变的枢纽。第六章至第十章是分析与西洋接触以后的中

国社会动的情形。静是原来中国社会的状况,动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动出于静,由静而动。我们若不明了前者,便不能明了后者。我们若不明了中国以前的社会,便不能明了中国今日的社会。因为静是动的背景,动是静的反应。两者同是中国问题的两方面。

上面这一大段话,解释了我写这本书的根本观点。

因为我注重事实的解释,因为我要提高读者的兴趣,并且因为我的目的在使读者明了中国的全局,所以用大刀阔斧的写法,不用什么考据引证的功夫。这是不能不预先声明的。

虽然这本书里面的文章,是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中间前前后后,一篇一篇写成在《新月月刊》、《东方杂志》、《人文杂志》及《自由言论》等刊物发表了,但现在收集起来,整理成书,自始至终,还不失为一贯的道理。除了因为环境关系有所删减外,大体还保存了原形。

本书本来是《中国问题》的上册,还有一册名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出我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见,将来总有机会与读者见面。

最后我要向许多中外的作家道歉,因为有时候我借用了他们的材料,现在不能一一提名出来,向他们表示谢意。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七日

第一章 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

(一) 地 理

让我们先打开中国地图来看。我们东南有黄海、东海、南海,以及那浩大无涯的太平洋。在汽船没有通行以前,海禁未开的时代,这种天然的界限,便使我们不但与西洋各国隔绝,并且与日本也少往来。迤向西南,我们便有那高高不可攀的喜马拉雅山脉,把我们与印度分开。正西方面,乃是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所在。我们若是想由此路,以通欧洲,不要说以前感受困难,就是现在也很难通行。至于北方,不但那大块不毛的戈壁沙漠把我们包围着,并且即让我们走远一点,以前也是一片没有人烟的西伯利亚平原。我们中国还以为与外界隔绝不周到,自己又筑了一条万里长城,从西北以至于东北。我们中国社会以前处在这种四围闭塞,交通不便的情形底下,并且在西北所遇到的又是些文化较低的部落民族,于是我们的祖先自然而然发生两种观念,经数千年以至于与西洋各国发生关系,牢不可破,给了我们中国的历史以很大的影响。

第一种地势所给我们的影响,便是天下主义。我们的祖先,因为地势隔绝的关系,不知有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存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虽然常常与我们捣乱,但他们并不在我们的眼里。我们以为中国便是天下,天下只有中国,一谈到中国,便包括全世界;一谈到天下,心目中只有中国。我们在一切古籍里,随处都可找出这样的例证。在没有与西洋接触以前的中国人的脑筋里面,对于中国与天下,不见得有什么分别。并且因为我们素来与外界很少发生接触的缘故,很少受过其他国家的侵略,国际关系上没有什么竞争与冲突。我们以前在历史上所遇见的,都是些部落民族,他们并无所谓国家的组织。我们的祖先既然没有外国的对敌,自然不觉得有国家组织的需要。因此,我们中国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

* 同题文章原刊《新月》第3卷第4期,1930年6月10日。其中之“引言”改为此书之“序文”。

第二种地势所给我们的影响便是保守主义。我们的祖先,既误认中国为天下,不知有西洋文明的存在,而附近所看见的又是些尚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部落民族,自然容易发生一种自满的心理,以为中国文化是最高无上的。有了这种自满的心理,当然很容易认为中国一切的制度文物已到了无以复佳的境界,我们只要保守,毋须改进。中国社会之所以变成僵态,经两千多年没有多大进步者,未始不是受了这种保守主义的影响。当西洋各国初派使臣来要求通商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来进贡称藩的,非要他们叩头不可,后来屡战屡败,才知道这些“西洋鬼子”的厉害,我们自己实在有改革之必要。

若是我们拿欧洲的历史地图来比较,由希腊以至于罗马,再由罗马以至于现在。各国地势的犬牙交错,交通频繁,无一不是促进他们的国家自觉。我们单拿希腊来讲。希腊虽然面海,但地中海没有太平洋那么浩大,不能使她与埃及文明及巴比伦文明隔绝;东通小亚细亚,与波斯各国接触,没有帕米尔高原站在中间;北则连贯大陆;西则与意大利半岛遥对。岛屿林立,种族复杂,竞争很烈。虽当时希腊的政治组织,限于所谓城市国家,然惟其因为是城市国家,才同时有许多具体而微的国家的存在。相互之间,竞争极烈;竞争激烈,便发生了与中国两种刚刚相反的结果。第一是爱国心。各个小国对峙之下,自然产生一种自觉。雅典的人自然爱雅典。斯巴达的人自然爱斯巴达。不但如是,雅典和斯巴达为各自争生存及胜利起见,对于政治组织,不能不求完备;对于其他一切,不能不求进步。因此第二个结果便是进取的观念。社会常在动的状态。愈动愈进化;愈进化愈发展。所以我们看西洋文明,有如长江大河一般:急滩之下,又有深潭,深潭之下,又有急滩,曲曲折折,变化无穷。中国文明则如池水一样,原来是一怎么样,现在亦是一怎么样;原来是多少水,现在大概仍原是多少水。水总是死的,不会流动。有时池面纵被大风吹皱,但不久仍归平静。静是它的本体,变是它的例外。因此我们的文明,虽然开发较早,却是进步极慢。西洋文明虽然开发较迟,却是进步极快。一静一动,一慢一快;一重保守,一重进取。结果,后来居上,我们倒是落伍,一经接触,我们便没有力量反抗。

除了我们的周围是封塞的地势外,我们要认清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岛国,像英国、日本一样;亦不是一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一样。中国乃是一个广大的大陆国家。内地纵横数千里,山川深阻,不便与他国通商。而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河流,又自西朝东,蜿蜒中国本部,可供灌溉。土地肥沃,温度适宜,乃一天然的农业国家。并且就气候与物产而论,因为中国是一个广大的大陆国

家,所以地跨寒温热三带。北方的皮毛,沿海的鱼盐,中部的麦米棉麻,江浙的丝茶,无不备具。至于矿产,如金银铜铁之类,在农业社会里面亦很够用。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完全经济自足的农业社会。生在这种国家的人民,生活非常简单,可以自供自给,没有与外国通商之必要。自己固然没有什么工业品输出,亦不需要什么工业品输入。不但对外如此,就是国内各地方的经济关系,亦无很多相互交换的机会。各个农村,差不多经济上可以独立。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什么大工业,自然没有什么大商业;没有什么大商业,自然不需要便利的交通。交通不方便,自然各方的关系不能密切,集中的组织不能形成,思想智识无由交换,整个社会只能在一种静的状态底下过活。换句话说,这种国家,结果是很保守的;它的组织决不会严密的。

(二) 人 民

中国所包括的民族,普通说来有五:曰汉、曰满、曰蒙、曰回、曰藏。其实还有一被人忘记了的苗族。这六族都有可以明了分别的界线。满族以东三省为根据,蒙族奄有内外蒙古,回族以回教为标准;藏族以西藏为活动范围;苗族则出没于南岭山脉,川、滇、黔、桂、粤、湘之山间。至于汉族,实为构成中国的主要成分,遍布中国全部,为中国全部历史的中心。但所谓汉族自晋代五胡侵入之后,早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如满洲族之东胡,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之匈奴;回族的突厥、回纥;藏族之羌;苗族之一部分土司,都已混为汉族。故汉族实为一混合复杂之民族,可以代表现在所谓中华民族。我们一说到中国人的问题,大部分我们不能不以汉族为对象。

我们讨论中国人民的问题,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是量的问题,一是质的问题。先就量的问题而言,究竟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口呢?这个问题,很难为确切的答复,因为我们没有可靠的人口调查,现在关于中国人口的数目,都是出于估计,很难作科学的根据。譬如一九一〇年中国人口(东三省在内),据民政部的报告,为三三一八八〇〇〇;据一九二六年邮政局的调查,则为四八五五〇九〇〇〇。两相比较,前后不过十六年,相差竟达一万万五千余万之巨。不过我们根据最近立法院几位统计专家的意见,中国人口大概在四万万五千万左右。(依一九三三年《申报年鉴》估计人口总数为四八八三〇四〇二五人)^①

① 此段文字所用数字,较原初发表时补充了新的资料。——编者

假使这个四万万五千万的数目是近乎情理的话,那么就比法国大十一倍,比不列颠大十倍,比美国大四倍,比日本大七倍,比德国大七倍,比意大利大十一倍,比西班牙大二十二倍,比比利时大六十倍,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量的方面看来,中国人口不可谓不多了。但这种数目与中西接触以前的中国人口比较还是增加了呢?还是减少了呢?据各方面计算,所增并不很多,就是普通所谓四万万的数目,在道光十五年(即一八三五年)就有这么一个估计。从此一点,可见中国人口增加得并不很快,与欧美人口在百年左右约增加一倍的速度比较,实在有望尘莫及之叹了。^①

中国人口增加如此迟慢,难道因为生产率低吗?不是。我们中国的思想、制度,政府的势力,及经济的背景,无一不是鼓励生育的。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消说了。早婚、纳妾,亦是助长生产的原因。同时在大家庭制度之下,少年夫妇没有经济的负累,可以无限制的生产。兼之人民缺乏智识,生活很低,能以小小的收入,供给很多的人口。故中国人口的生产率,在全世界各国里面,算是最高的。据人调查,就是在二十年来天灾人祸的中国,人口的生产率还有千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与欧美先进国的生产率比较,差不多增加一倍。

既然中国人口的生产率高,为什么白人近二百年来增加那么快,中国人口增加又这样慢呢?我们要知道,人口的增加,不仅是生产率高的关系,并且要看死亡率如何。若是生的多,死的亦多,那么人口还是不会有什么增加。若是生的少,死的更少,那么人口还是会增加。中国人口之所以生的多,而仍不激增者,乃因为死亡率太高的原故。反而言之,欧美先进国之所以生的少,而人口反而激增者,即因为死亡率很低的原故。我们说到此地,便不能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中国人口的死亡率这样呢?

中国全国每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根据一九二三年邮政局的调查,为一〇四人;二十一省平均密度为二三八人。若是这个估计的确,那么比之德意志、意大利、比利时及英格兰等地的人口密度,表面看来,并不算密;若以全国总平均每方英里一〇四人而论,更不应有人满之患了。不过从中国面积所推算出来的密度,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人口经济。我们中国除黄河、长江、珠江、辽河及松花江流域之外多是不毛之地,不宜于耕种。据美国农业经济专家白克尔(O. E. Baker)一九二七年提交第二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论文说,全中国(西藏除外)共有二

① 此段文字较原初发表时略有调整。——编者

十四万万英亩的土地,其中有一半因为气候太干燥,不适于耕种。余下来的一半(百分之五三)因为温度不足而不适于种植的,亦占百分之五。所余的百分之四八,气候虽然合宜,但在山陵岩壑之间,地层硗瘠,不能从事农作的,要占其中百分之四〇。其余,还有百分之五是沙土。所以在中国的领土中,可耕种之地仅有百分之二九。所以我们要测量中国人口的生存机会,必须第一注意中国人口所占面积与世界人口所占面积之比例,第二须注意中国耕地的人口密度。

现在全世界人口总数约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左右。全世界土地面积总约五七二五五〇〇〇方英里。中国土地面积根据英文《中国年鉴》为四二七八三五二方英里。中国人口,我们上面已假定为四万万五千万。从此类事实来推算,中国土地面积占全世界十三分之一,中国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由此可知中国人口及土地面积,与世界比较,在各大国里面算是最相悬殊的了。以这样多的人口,占这样小的地方,其拥挤情形,可见一斑。并且全国地方,不是处处可以耕种的。据前北平经济讨论处的报告,可耕土地面积,只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一四·八。西藏、蒙古的大部分,现尚未从事于农业经营,不必去说。即以本部及新疆东三省而论,全部农田的面积,据农商部调查,不过一五七八三六五九二五亩,或三七四四六四方英里;又按政府估计本部,东三省,及新疆面积,总计有二四四六三六〇方英里,或一〇三一四〇〇〇〇〇亩。故中国本部、东三省,及新疆的农田总数,只占其土地面积百分之十六。姑以邮政局一九二三年的调查为标准,中国本部、东三省及新疆的人口总数为四三六〇九四九五三人,那么每方英里耕地人口密度为一一六五人。这个密度为世界各国最高者之一,与比利时耕地密度差不多相等,比日本约低一倍,比英国高一倍,比意大利高三分之一,比法国高四倍,比德国高五分之三。这些国家因为人口太多,耕地密度太高的关系,不得不提倡工业,以制造品向各国换取食物,故尚能得到经济的安全。现在我们中国向来就是一种农业社会,老早便有这么多的人口,在社会经济看来,其已经到了一个人满之点,可谓毫无疑问。

既然中国老早就到了人满之点,若是生产方法不改变,而同时人口不加多,还可勉强过去的过去。若仍原是农业社会,而又要鼓励生育,结果非闹出乱子不可。我们中国上了孔老夫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当,一方面不去改良生产方法,他方面又要添子添女。结果,人口的数目,超出食料所能供给的数目,换句话说,便是超过人满之点。其影响,只有发生绝大的经济恐慌,而造成疾病、灾荒、战争种种可悲的现象。人民死于疾病,灾荒者固多,而死于战争者更是不少。在